

洋它开放留痕

——丁波回忆录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洋书开放留痕

——丁 波回忆录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998



丁波同志 1948 年任“中艺”社长时摄于新加坡

迎賓松



方毅副总理(前右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总裁葛茨博士



1978年7月丁波陪同方毅副总理(左三)在北京师范大学
参观第一届外文图书展览



1982年9月23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中国美术馆参观英国书展，
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杨浚在书展门前迎接时留影



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江明(右二)在京会见加拿大书商和建筑商芦堡



西德使馆文化参赞特奥多尔参观 1978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外国书展



1979年10月23日中图公司在人民大会堂宴请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董事长布雷德利·麦克米伦先生(前排左四)



丁波向《斯诺眼中的中国》原作者路易斯·惠勒·斯诺介绍
中国学术出版社刚翻译出版的该书中译本，并赠书时合影



中图公司在北京仿膳宴请美国书展代表团



中国出版代表团与中国图代表团在哈佛大学亚洲研究所燕京图书馆前留影



中图公司代表团在东京举办的中国画展览会会场前留影



1986年9月丁波和何由摄于广州“中国歌舞剧艺社”成立40周年纪念会场前

自序

年逾花甲，自投“罗网”、踏入“洋书”门内，为时八载。在书的海洋中摸索，在实地工作中前进，总算留下了一些足迹。

《洋书开放留痕》，趁我耄耋之年，大病之后，整理旧稿集成，难免诸多错漏，聊以献给同仁参阅，诚望批评指正。

幸蒙公司吴仁勇、王钰龙等诸同志大力协助，又得老伴何由合作，在此一并致谢！

丁波 1997.4 于北京家中

目 录

一、大转折前的大波折	(1)
二、单枪匹马到“中图”	(14)
三、了解情况	(16)
四、成堆的问题	(20)
五、激昂的业务讨论会	(22)
六、一次党委扩大会议	(26)
七、第一次外国科技图书展览	(27)
八、文教读者座谈会	(32)
九、促进恢复、增办省外文书店	(36)
十、人才培训，当务之急	(39)
十一、危楼·宿舍·展览中心	(41)
十二、建立国内外分公司	(46)
十三、香港书业的探索	(48)
十四、从《国外书讯》到《世界图书》	(53)
十五、欧洲之行	(57)
(一) 紧张的巴黎四天	(57)
(二) 丰收的英伦八天	(65)
(三)、访问西德	(77)
(四) 南斯拉夫行	(92)
十六、紧张的访美一个月	(100)

十七、访问加拿大的重要任务	(152)
十八、访日启发	(168)
十九、澳大利亚书业浅见	(184)

一、大转折前的大波折

1960年，我从广东拖拉机厂调到中央对外文委中国演出公司任经理。六年中，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我带领文艺队伍，出国访问欧、亚、非各国，又接待不少来华访问的文艺团体，可以说工作十分顺利。

浩劫十年中，我成了挨批、挨斗的重点对象，妻离子散，下放监督劳动，在凄风苦雨中虚度大好年华。直到1973年，恢复组织生活，并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听候分配工作。

这时候，与我在“劳改”中同甘共苦的对外文委副主任李昌同志，已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任副院长，他问我愿不愿意到科学院下属单位任职。我想：我是30多年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对自然科学一窍不通，所以没有接受。他又劝我回演出公司任原职，我一想起当年那些造反派的狰狞面孔，就毛骨悚然，感情上难于弥合，表示坚决不回演出公司。

有一天，在李昌同志家，碰见了科学院院长胡耀邦同志，他们两人都希望我到科学院所属的单位任党委书记。我仍然以“不懂科学，不能领导科学”为由，婉言拒绝了。他们想了一会，很为难地说：“可以到中国图书进口公司去，不过那是一个付局级单位，而且已经有了第一把手党委书记，你去只能降格任用，当经理，是第二把手，”要我仔细考虑。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我根本不

考虑这些，只希望尽快参加工作，把十年失去的时光夺回来。”到中国图书进口公司去之事，就此决定下来了，只等正式通知就上班。

有的朋友告诉我许多困难，好意劝阻。从演出公司到图书进口公司，应该说是一大转折。但在完成这一大转折前，却先遇到了一个极大的波折。但这些我都不予考虑，一心一意属于“中图”的人。

在即将上任的前夕，科学院突然通知我：“情况变了，院核心组决定你去接收国防科委的 109 厂，那是一个搞集成电路的工厂，我们急须派临时性的工作组去。现在已经决定原科技局王局长任组长，你任付组长，协助他工作”。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我的工作道路上，会来一个这么大的转折。我一时真接受不了，我问李昌同志：“不是早已决定我去‘中图公司’吗？我大半辈子搞文艺，在演出公司多年，又有一些外事经验，‘中图’是既有‘外’，又有‘文’，我会很快熟悉门路的。为什么突然变了呢？”李昌同志说：“没有变，你去 109 厂是短期的紧急任务，最多三四个月，生产上去了，你就可以调回来，仍去‘中图’上任。”

组织的决定，不能固执己见，我只好接受了。那年，我已 60 岁，骑自行车一小时才能到达工厂，因为一心要扑到工作上去，所以并不觉得太辛苦。第一次走到 109 厂门前，好几个工人看见我这老头就问：“你是科学院派来的工作组付组长吗？”我说：“我身上没有贴标签，你们怎么知道？”他们知道猜对了，很高兴，三步并两步地跑回车间，传达消息去了。

见了王组长，他温文地带我到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前，指

定这是我的办公桌，说下午要开个全厂大会，宣布工作任务，并顺便把我介绍给大家。

在一间小礼堂里，工人们各自带一张小板凳，东一堆，西一群，无秩序地交头接耳。大会开始了，王组长生病之躯，声音微弱，会场气氛虽不能说是一片嘈杂，却也不算安静。当介绍到我的时候，即刻安静下来了。王组长特别详细介绍我的革命经历。工人们听到我30多年从事文化工作，都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的，又有外事经验，会场里大哗起来，“真棒啊！”“我们终于有好领导了！”事后，我问王组长“为什么这么详细介绍我的经历。”王组长说：“这个厂是军队办的，职工大多是军人家属，并有不少高干子弟，他们注意领导干部的资历，尤其敬重周总理。详细介绍你，是为了今后工作好做。”

果然，以后每到一个科室、车间，工程师、工人都把我当长辈，无拘束地和我谈话，使我从他们的谈话和工作中，学到很多东西。

科学院在胡耀邦、李昌同志的领导下，在“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学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的精神鼓舞下，109厂上下齐心，干得十分起劲，生产很快走上了正轨，出了成果，此后的工作可以既顺利而又省心地进行下去了。我看到这种情况，天天倒计时数着、盼着去“中图”的日子早日到来。但是如果要我留下来的话我也许会同意的。不料王组长突然重病住院了，1976年3月中旬，我担任了党委书记成了厂里的临时当权派。从而也就处在风口浪尖上，时时接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冲击。

这个时候，“四人帮”掀起一阵“批邓、反击右倾翻案

风”的恶浪。科学院政治部紧跟“四人帮”的走狗们，天天派人到厂里了解情况，催着要汇报；后来逐步升级，竟然批斗起李昌和胡耀邦同志来了。形势一天紧似一天，按我三十多年来历次运动的经验：恐怕在劫难逃，我也可能是运动的对象了。尽管科学院“政治部”走狗，一篇篇文件发下来，又是派人来，又是电话紧逼，要厂里举行批邓大会，起初我还能以“生产忙”来拖拉搪塞，但后来已无补于事了，顶不住了。

1976年1月8日这个举国悲恸的日子，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了。没有人性的“四人帮”下了“五不许”的禁令：不许开追悼会，不许戴黑纱，不许戴白花，不许设灵堂，不许去天安门。十里长街送灵车时，厂里这批热爱总理的干部子弟，根本不理会那些禁令。各车间照样悬挂起围着黑纱的周总理遗像，挂起“痛悼敬爱的周总理”横幅。白天搞生产，夜间，女工做白花，男工制花圈，大家庄严肃穆。见了我，也不回避，反而问我：“丁书记，你支持我们的行动吗？”“你别明支持，暗汇报啊！”我说：“我跟随周总理干革命四十多年，对他的感情，不会比你们薄。”我和工人们的心融会了，他们对我更为相信了。可是当时我的职务，不容许我明显地支持他们，只能情深意重地从旁支持他们。

自从总理逝世之日起，工人们再也没有笑容了，悲恸的气氛，笼罩着工厂的每个角落。科学院居然派人到厂里，命令各车间撤下悼念的横幅、标语和人们臂上的黑纱。工人们虽然照办，可他们走后，一切又恢复原状。

到了三月间，天安门广场陆续有工厂、大专院校，前去

悼念周总理。科学院政治部怕得要死，下通知不许 109 厂的职工去天安门。虽然党委办公室把这通知照转各科室、车间，可是谁也不理，好几个车间反而又一次悄悄扎起更大的花圈。人们看见天安门广场上，有人把钢筋扎起的、写着“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的大花圈高高地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109 厂的军人子弟，决心要表示更深切的情感，他们夜以继日地制作了四块大匾，用白花缀着四句话：“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妖魔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并且趁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的时候，在科学院派来的监督人员眼皮底下，一个个溜出会场，悄悄地开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到天安门挂匾去了。使从科学院来的政治部主任只得瞪大眼睛，无可奈何地走了，“批邓”大会也就不了了之。

下午，一个支部书记悄悄地告诉我：“今天我厂百多人去了天安门，几个大力士抬着花圈和四块匾引路，大家戴着黑纱、白花，低头跟着走，经过王府井，转入东长安街，沿途跟随的群众，至少有千人以上。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由几个大汉爬上碑塔，把四块高六米，宽一米五的竖匾，用铁丝牢牢捆在纪念碑的顶层，醒目极了！好些人在念，在抄。路过天安门前的人，都驻足观看，还说：‘109 厂好样儿的’！”他说得眉飞色舞，我听得胆战心惊，我想：“这下可要闯祸了！管他呢！”

五月中旬的一个上午，我照常到了工厂。一个车间支部书记低声告诉我，“科学院派来了一个新的工作组”。我走进党委办公室，看见几个素不相识的人。原来党委办公室的一